

9·30运动和国罪行第十二章 侵犯法律和践踏人权的行爲 5

者，在1966年已年过八旬。最年轻的是萨利姆·本德马尔，人民青年团团员，在1966年只有15岁。他与父亲祖父一起住在监狱里，他父亲是卖菜的，祖父是卖冷饮的。三世同监。

萨伦巴是最拥挤的监狱。我的囚犯生涯大多在此度过。

在这里我与家人见面很少。从1967到1968年，不允许我与家人见面。以后才获准每月见一次面，每次10至15分钟。

第三类被关押在雄牛广场地区的军事拘留所。一般情况下，关押在那里的人要准备到庭受审或作证。苏迪斯曼、约诺、苏帕尔佐、鲁斯兰、穆尼尔等都关押在那里等候到庭。我从1969年至1972年也被关押在那里，共3年。

在这3年中，我本来准备到庭受审，却经常被询问。原来，当局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审判我。被审判的却是黄自达。

在这所监狱，与家人见面容易得多，可以每周一次。还允许每天送饭。伙食也好得多。由于安置在这里的政治犯在准备到庭，他们应该看起来比较健康。因此，



苏班德里约在高等军事法庭上

供应的食品比萨伦巴好得多。当庭审进程启动后，有时维生素的提供也会跟上，给人的印象是被告所受的待遇还不错。

第四类是要人政治犯。他们被囚禁在离哈林地区附近的尼尔巴亚（意为“危险的拘留”）集中营。这个集中营有250间房，配备了床、书桌、客厅、浴室和卫生间。但政治犯住的大约只有50间房。

在尼尔巴亚关押的要人政治犯曾担任过部长、将军、大使，其中有苏班德里约、奥马尔·达尼，普拉诺托、陆克曼、穆勒师德、斯蒂亚迪、阿斯特拉维纳塔、黄自达等。他们都是重量级的。

我自己也有幸在这个VIP监狱住了一年，从1972年到1973年，然后搬回萨伦巴。

尼尔巴亚的囚

犯待遇相当不错。很少有羁押在尼尔巴亚的人遭受过肉体上的折磨。由于有许多将军，监狱官员一直都很有礼貌。每个政治犯可以“拥有”两个或三个房间。在阅读资料的规定方面，虽然有限制，但还是相当宽松的。偷偷带入阅读资料比我经历过的其他监狱容易。家人每天都可以送饭。监狱提供的伙食比起其他的监狱算是相当不错了。此监狱的政治犯不缺吃的。

犯人患病时可以送到陆军医院，不同于萨伦巴和唐格朗。重病的政治犯仍然得不到妥善的治疗。这促使监狱里设诊所，由囚犯医生提供最低限度的治疗，主要是针灸或穴位按摩。许多政治犯由针灸医生培训后，在监狱诊所帮忙。

于是出现了怪现象。这些重量级的

人物别可以享受比那些归类为“追随者”和“普通成员”好得多的囚犯生活。

大规模逮捕所引发的怪现象是残酷的。一方面，供应囚犯伙食的资金非常有限，另一方面，军事统治者竟然愿意花大量的资金、人力和设施，以打造这几万名政治犯的形象。

供应普通囚犯的食物质量和数量都非常差。从1966年到1967年，给囚犯吃炒面粉，是一种进口的马粮。大多数政治犯由于家里贫困和社会的恐惧而没有家人送饭，只能靠马粮活命。因此，许多人由于缺乏食物和营养不良而死亡。

食物对于囚犯当然至关重要。食物不足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，加速耐力损失，生命将无法维持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在萨伦巴以及许多其他监狱，有家人送饭的人，被要求组成用餐集体，称为“riungan”。

我属于有家人送饭的幸运者。我必须与6到8人分享我家送来的饭。这饭在半小时内被大家消灭光。

在新秩序时代初期，相当多政治犯以为拘留期会很短。谁

也没想到无辜的自己会被关押十多年，更不要说那些参加过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，甚至那些在革命时期和实际战争中曾经是苏哈托部下的人。但他们都失望了，当政治犯遭罪的日子竟长达十多年。

各监狱的囚犯越来越多，出现了不舒服的问题。在我住了多年的萨伦巴监狱，囚犯人数是可容纳囚犯人数的4倍。其结果是，本应只住一个人的牢房住进了四个人。大家必须轮流睡在只够一个人躺的小垫上，其他三人坐着。如果有一个人要上厕所，所有人都必须站起来让出走路的地方。

审讯期间所犯下的暴行是无法想象的。几乎每一次审讯都有严刑拷打。包括对女政治犯。女政治犯遭到强暴的现象时有发生。许多政治犯因遭受酷刑而不得不去医院治疗。不少人因此落下终身残疾。经常有囚犯在刑讯逼供后死亡，或是在审讯中即被杀害。约诺便是被残酷折磨致死的人物之一。

我算幸运，从来没有受过酷刑，虽然有时候当面目睹我的朋友遭受折磨，或